

威權國家如何回應另類教育：中國大陸另類 教育之發展、治理與挑戰

林顯明*

摘要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威權國家中，具有挑戰由國家主導之體制內教育體系運作的另類教育模式，如何在威權政府接受程度不高的情況下進行發展呢？研究者以中國大陸為研究對象，運用國家與社會關係（state and society relations）的互動性觀點作為分析架構，探討另類教育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情形及其與威權政府互動所展現的特徵。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受限於當前兩岸關係與政治情勢，本研究主要運用文件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透過使用多個中英文資料庫和搜尋平臺，蒐集和本文研究問題相關之學術研究文獻、政府政策報告、評論性文章和新聞媒體報導等進行分析。在質性文件分析法的步驟方面，研究者在多次閱讀和分析所蒐集的文件檔案後，再經過閱讀、描述、分類與詮釋等四步驟的寫作過程，進一步地回答本文的研究問題。

研究發現或結論

本文研究發現，中國大陸威權政府在面對不同類型之另類教育時所採取的態度和治理策略有所不同，且不同類型間乃至於同一類型內之不同時段中也存在著差異性與多樣性。中國大陸政府對於「在家教育」和「華德福學校」之另類教育形式最為寬容，所展現出來之國家與社會互

動關係較類似於「包容性鑲嵌」；對於具有宗教性質與色彩的「教會學校」和「讀經學校」所採取的態度最為嚴厲，所建構出來的互動關係屬於較為緊張的「壓制性鑲嵌」；而「創新學校」和中國大陸政府之互動關係居於中間位置且較為和諧，所展現之互動特徵則較類似於「包容性鑲嵌」。

研究原創性／價值

本文為目前少數運用國家與社會關係之理論架構來探討中國大陸另類教育發展及威權政府治理特徵的研究成果。對此，本文的研究成果未來或許可進一步拓展成為針對另類教育在不同威權國家發展情形，及與所在地政府互動關係等議題，進行深入比較與探討的基礎。

教育政策建議與應用

本研究除了可提供對於東亞不同國家另類教育發展與治理有興趣之讀者，瞭解在不同國家與社會脈絡下另類教育的發展情形、政府治理與社會互動之特徵外，亦可作為學術界和政府單位研討不同國家進行另類教育政策擬定和治理工具運用時的參考和比較研究依據。

關鍵詞：中國大陸、另類教育、威權國家、國家與社會關係、教育治理



DOI : 10.6869/THJER.202406_41(1).0003

投稿日期：2024年5月14日，2024年8月6日修改完畢，2024年8月14日通過採用

* 林顯明，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E-mail: hsienming79@mail.nptu.edu.tw

壹、前言

本文的研究主要針對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在威權的政治體系下如何發展，以及威權政府又會選擇以何種方式治理與政府所建構之體制內教育體系不同的教育思維和實踐方式進行探討。雖然，目前在學術文獻中，對於如何準確地定義另類教育有著多元與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數論者所接受的是，另類教育是一種不同於傳統及正規之教育體系，特別是在大多數的國家中，正規教育的內涵和教學內容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政府）所決定、控制和管理的。而另類教育則是希望在國家之正規教育範疇外，嘗試不一樣之教學方法和教育實踐的可能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另類教育時常被歸類成具有批判性質之教育體系，因此，另類教育無論是在教育哲學的層次或者實際之教學實踐活動等方面，都具有批判由國家所主導和建構之傳統和正規教育體系的特質（Engelmann, 2022）。

國家如何看待以及治理另類教育即成為了政府在面對和管理另類教育體系時的重要議題。然而，雖然另類教育在不同國家和社會中容或有不一樣的發展脈絡和實踐經驗，但一般而言，另類教育要在一個國家之教育體系中獲得生存與發展的空間，需奠基在該國家政府能創造出一個相對自由的社會和教育空間、以及較為民主的校園政治氛圍下，才較有可能實現。其原因在於，另類教育體系的發展所牽涉的，不僅是不同於體制內教育之教學方法和教學策略的使用，更涉及到國家如何定位自己在教育領域中扮演的角色、教育系統如何看待與容納不同於體制內之多元和多樣性教育實踐的嘗試，以及教育選擇權究竟是在國家手上還是在學生和家長身上等具有敏感性的教育治理議題（Kelly, 2014）。

換句話說，另類教育的發展不僅牽涉到個人層次之學生或家長在不同教育體系間所做的選擇，其在不同國家和社會中是否能夠取得發展的空間還會牽涉到國家／政府和社會／教育體系所建構出來的互動關係。若國家對於其和社會與教育體系的看法和想像奠基在強制性或侷限性的觀點時，那麼另類教育要在一國中獲得發展之機會和取得社會正當性的可能性就較小；相反的，若一國政府能以較為自由和開放的態度，容納和接受不一樣之教育想像和多元教育實踐之可能性的話，那麼另類教育

在一國社會脈絡中即有可能獲得較大的發展和存續的空間。對此，一個合理的想法是，另類教育因其所具備之批判性特質，如是的批判性教育思維和教育實踐在民主國家或自由社會氛圍下應較具發展的可能性，而在一個對教育體系運作採取較強之管控的威權國家中，要能獲得發展的空間與機會則可能較為有限（馮朝霖，2001）。

回到本文的研究關懷，研究者對於全球擁有最多中小學生人口數，且近年來選擇就讀於另類教育體系之學生人數成長快速之中國大陸的發展經驗感到好奇。特別是，另類教育體系如何在政治體制依舊維持威權主義且社會自由化程度尚大幅受到政府影響和管控的情況下，獲得發展的空間與存續的機會呢？而身為威權國家之中國大陸政府，又是如何看待及治理不同於正規和體制內之另類教育體系的呢？為回答上述問題，研究者將運用國家與社會關係（state and society relations）和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探討和分析中國大陸之威權政府如何看待與治理多元之另類教育體系和實踐經驗，藉此補足當前針對另類教育在威權國家發展議題討論之不足。

以下研究者將依序梳理和討論另類教育的概念與發展、另類教育在東亞國家和中國大陸的發展情形、國家與社會關係和教育治理的理論觀點，以及運用理論架構針對中國大陸另類教育發展與治理進行分析，並在本文之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結論與討論。

貳、另類教育的概念與發展

當吾人欲探討另類教育和傳統與體制內教育有什麼不同時，必須要先回答，學校教育在孩子及學生學習的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而其不僅是一個實務的問題，更是教育哲學中一個難解和持續被論辯的議題。從拉丁文對於教育（education）所進行之定義與意義解釋來看，教育的意涵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大致可從educare和educere所代表的兩種觀點來進行瞭解。有論者認為，educare字詞對於教育的看法較類似於今日體制內和主流教育（mainstream education）的觀點。在如是思維下的教育所強調的是，要培養和訓練（to train）學子在接受過教育後能展現出符合社會期待的氣質與行為，並在過程中傳遞國家和主流群體所欲傳播與

建構的知識內涵。對此，從這個思維來認識教育的話，其所能夠允許個人獨立和多樣性發展的空間相對較小。相對下，educere字詞所衍生的教育意義為引導出（to lead out）或勾勒出（to draw to）孩子和學生的潛力，及對於自身多元的想像和對於知識追求本真性（intrinsic）的內在學習動機與成長的動力。因此，在如是思維下，教育扮演的角色則是提供孩子與學生一個可以自由和大自然接觸、探索自我與獨立追求知識之安全的學習環境與空間，而許多另類教育或非主流（非體制內）教育的辦學理念多是在這樣的思維下產生和運作的（Bass & Good, 2004; Nagata, 2016）。

總體來說，由國家和政府所建構的正規與體制內教育較具educare的特性，亦即透過由國家所制定的正式及具系統性之課程指引來對學齡學生進行知識的傳輸，且較傾向使用標準化（standardized）和一致性的評量評斷學生的學習成效；而另類教育所持的教育思維較類似於educere的觀點，亦即它們更重視學生的自主性、學習的多樣性以及知識傳遞的動態性和可能性等，在這樣的情況下，另類教育和非正規教育的教學模式即不那麼強調單一的途徑、方法或標準化的評量標準。相反的，如何最大程度地尊重每一位孩子的差異、激起孩子們對於追求和瞭解知識的本真性與學習動機、及運用多元的評量方式來衡量和記錄學生的學習過程、狀態與意義建構等，才是另類教育在educere思維下所建構出來的教育實踐方式（Bass & Good, 2004）。

然而，本文的目的並非在比較或評斷這兩個字義所衍生或代表之教育思維何者較優或較適切，也並非要傳遞educare與educere兩種教育思維之二分法的概念。研究者透過這兩個教育字義的梳理與討論是希望能藉此瞭解教育功能與意義的多樣性，亦即在不同國家中，上述兩種教育思維所引導和建構出來之教育體系與教育實踐兩者間並非全然的互斥；相反的，這兩種教育思維及具體的實踐經驗是有可能同時存在的，但其各自所占的比例，及在不同國家之教育體系中所分別扮演的角色和社會接受程度等，都會受到不同國家之政府對於體制內與另類教育體系之看法、觀點和具體之治理方式所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兩種教育思維所衍生出來對於教育的不同想像和實踐嘗試，皆可追溯至兩位同為教育和政治哲學家的Hobbes以及

Rousseau對於教育的看法和教育在人們成長及學習過程等議題的論辯內容中。從Hobbes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本性是自利（selfish）的，且對於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中追求權力（power）是有慾望的；然而，若社會中的所有人都僅依循著追求自利和權力極大化的話，其對於社會運作將可能產生負面的衝擊與嚴重的後果。對此，Hobbes認為為了在真實的社會中有序與和平地共存與生活，人們就必須要接受有系統的的教育和訓練，因此，教育對於Hobbes來說必須是權威的（authoritative）（Hobbes, 2018）。相對下，Rousseau對於教育的看法與觀點就和Hobbes有著很大的不同，從Rousseau的角度來看，教育的功能與目的是要去除加諸在人們身上過多的限制，並允許孩子和學生在學校安全的環境下探索自我、培養自身潛力和健全人格的全人學習環境（Knežić, 2020）。

事實上，另類教育思維與觀點的濫觴如上所述有著其百年的歷史，而另類教育之教育哲學和具體的實踐方式在經歷了百年的發展後，如今已發展成自成一格但同時多元並存的教育體系。Mills與McGregor（2017）綜合整理了當前在國際上較為常見的另類教育類型，包括華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蒙特梭利教育（Montessori education）、耶拿學校（Jenaplan education）、民主學校（Democratic schools）、生態學校、體驗學校等多種不同的類型。雖然上述各類型之另類教育在理念上和具體之執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另類教育所代表的理念即是和由政府所主導之正規教育體系有所差異，有時甚至處於衝突的狀態。因此，另類教育要在一國或社會獲得較大之發展空間，常需要政府較為寬容的態度和治理方式的配合才較有可能實現；而如是的發展前提，讓研究者對於另類教育體系在非民主的威權國家之發展情形，及其所呈現之和政府的互動關係感到興趣。

參、另類教育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相較於另類教育在西方教育思維與環境中較長的實踐經驗，其在中國大陸的興起與發展則是較為晚近的現象，以下數項因素被認為是促進另類教育在1980年代後於中國大陸獲得發展空間與契機的原因。首先，

中國大陸政府於1980年代實施了數項鼓勵私人與民間投入興辦教育之政策，此開放民間辦理教育事業並向公眾提供教育服務的政策契機，給予了中國大陸社會可導入和引進不同於體制內學校的多元和另類教育思維的空間（Hannum et al., 2007）。如是之發展與中國大陸政府於1980年代起所選擇和執行之一系列的經濟開放與社會改革措施有關，亦即在改革開放的整體性思維下，賦予民間社會更多參與辦理教育之機會成為當時和經濟改革開放相向同行的轉型政策。而在改革開放及經濟獲得一定的發展成果後，為數眾多的中國大陸民眾之經濟條件獲得了改善，並且也因著經濟改革開放創造了在社會中新興之布爾喬亞（bourgeoisie，亦即中產階級）。這些新興之中產階級獲得了經濟條件的改善及社會階級位置的改變後，他／她們對於要求更高品質之子女教育有了更多的想望，況且，隨著中國大陸社會愈來愈開放，民眾有更多機會接觸到西方較為創新和前沿的教育理念後，以考試為導向和以認知教學為主軸的體制內教育實踐方式也面臨到愈來愈多的質疑及創新轉型的挑戰（Crabb, 2010）。

其中，被譽為世界最艱難之考試的中國大學入學考試「高考」（gaokao），即成為許多中國大陸新興中產階級乃至於社會中上階層家長所不滿和批判的對象，其原因在於為了擠進中國大陸大學的窄門及在「高考」中獲得最佳的成績，眾多高中階段的學子為準備考試所過的生活，被許多論者認為扭曲了生命成長的意義並造成了教育目的異化（alienation）的結果。對此，符芬菊（2020）認為，在過度強調競爭和追求卓越的中國「高考」和體制內教育制度所培養之中國青年的眼中，只看得見他／她們對於追求線性和無止境成功目標的想望，但所付出的成本卻是失去了在教育和學習過程中自我成長的喜悅。另外，對於這個看似擁有一致性標準的「高考」相關之研究顯示，為了在這場世界最難之考試中勝出，不只學生必須在準備考試的過程中過著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的艱苦生活，有意培養孩子能夠在高考中勝出之家長們，也別無選擇地必須準備好所擁有之有形、無形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類資本，來供給他／她們的孩子在高度競爭之教育環境中所用（Lin, 2018）。然而，不令人意外的是，如此超高度競爭的中國「高考」，不僅造成為數眾多、無法適應正規教育之青年學子在學習過程中

感到挫敗，在社會中位處於非中上或中產階級的一般家庭更成為在高考競爭過程中敗下陣來的一群，不僅讓「高考」制度成為有些論者所認為之社會階級複製的場域，也讓中國大陸教育體系成為了擴大其社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Chiang, 2022）。另外，其他促成愈來愈多之中國大陸家長選擇將孩子送到另類教育學校，而非傳統體制內學校的原因還包括：體制內教育過度強調課業競爭與考試導向（exam-oriented），其學習過程中過於頻繁和密集的考試，被認為可能因此扼殺了孩子們對於學習的動機與樂趣，也對學生培養創造力和全人性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林顯明、黃鈺淳，2024；Naftali, 201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大陸另類教育快速成長的發展趨勢得到了國際媒體的關注，但因另類教育到目前為止並未在中國大陸的法律體系上獲得明確的定位、規範與保障，故在中國大陸依舊處於曖昧不明之法律灰色地帶當中（Schulte, 2018）。另外，由於本質上，另類教育所主張的教育思維及所實踐的教學策略與方法等，皆被視為是對於體制內教育作為不滿的一種回應，在此情況下，另類教育所持的理念及相應的教育系統，也就無法得到來自具威權性質之中國大陸政府完全的接納與信任，亦即中國大陸政府當前對於另類教育依舊採取保持警覺的態度。因此，有論者認為，當前中國大陸之另類教育體系在學校建置、課程內容與課程綱要安排、教學方式實施以及辦學績效評鑑等面向，依舊受到政府強力的影響與控制（Wang & Chan, 2015）。

中國大陸政府對於另類教育所持之謹慎與保持距離的態度所造成的具體影響之一為：目前中國大陸政府並未公布另類教育學校的總體數量等相關統計數據。因此，吾人僅能從相關之調查研究與報告的數據中，試圖拼湊出當前中國大陸另類教育學校的數量與發展情形。根據楊東平與袁芳艷（2013）的調查，在2012年底時，中國大陸所擁有之非體制內書院學校的數量近600所，透過線上方式所辦理之虛擬書院的數量達100多所，華德福學校的數量約120所之譜，教會學校的部分也有近200所的規模，而總體就讀於非體制內之另類教育學校的學生人數則來到約十萬人左右。除了無法準確瞭解學校與就讀學生之數量外，另一個影響則是對於當前中國大陸究竟有多少種類型之另類教育學校的看法亦相當分歧，例如王楠（2020）的研究指出，因為中國大陸政府

對於另類教育所採取之警慎、觀望以及保持距離的態度，故在中國大陸的教育環境及政策語境下並不直接使用「另類教育」一詞，且也未對另類教育做出清楚和明確的定義。其研究發現，目前在中國大陸有超過十種名詞被用來指涉不同於體制內之另類教育體系，包括新教育（new education）、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選擇性教育（selective education）、實驗性教育（experimental education）、教育系統外之教育（education outside the system education）、學校體系外之教育（out-of-school education）、非主流教育（non-mainstream education）、獨立教育（independent education）、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華德福教育、蒙特梭利教育、創新學校（innovative school）以及經典學校（classical school）等。

本文中有關中國大陸另類教育類型之分類主要是依據Xu和Spruyt（2022）的整理與歸納的研究成果而來，其研究歸納當前在中國大陸的教育環境中五類發展較為明顯之另類教育類型，包括在家上學（homeschooling）、華德福學校（Waldorf school）、讀經學校（classics reading school）、教會學校（Christian school）以及創新學校。雖然不同論者對於定義與分類中國大陸之多樣的另類教育實踐與類型有著不同的觀點與看法，然而，由於該文是當前針對中國大陸另類教育類型學分類與討論之文獻中較具系統性和時效性的研究成果，因此，在針對中國大陸另類教育類型分類架構的實用性和時效性的考量下，研究者採用了Xu和Spruyt的五分類方式作為本文進一步分析與探討的基礎。

讓研究者感到好奇的是，在中國大陸政府未完全接受且在法律體系上無明確定位的情況下，另類教育是如何在中國大陸的教育脈絡中獲得生存機會？而擁有高度介入和控制力的中國大陸政府又是如何面對和治理愈來愈多元之另類教育體系與實踐經驗呢？為回答上述研究問題與關懷，研究者將進一步運用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論觀點作為本文的分析架構，並據此探討身為威權政體之中國大陸政府是如何面對與治理如此多樣化發展之另類教育體系，以及在目前治理的機制下，中國大陸另類教育又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困難與挑戰。

在研究方法的部分，須加以說明的是，考量到當前之兩岸關係以及資料可及性（data accessibility）之限制等議題，因此，研究者採取文件

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作為本文主要之研究方法，其常見於質性研究典範中，是一種針對所欲探討議題的相關研究檔案及文獻進行深入式閱讀和分析的研究途徑。而運用文件分析法進行相關議題之研究時常被運用的分析步驟有四個，包括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研究者透過來回多次地執行上述四個步驟，藉此進一步地針對所欲研究之議題的背景、成因、影響、意義及其過程等進行深入的梳理、分析和討論（Bowen, 2009）。另外，一個品質精良的文件分析研究成果有賴於界定和來源清楚的資料蒐集過程，而如前述，因受限於當前兩岸情勢與政治氛圍，研究者較無法透過質性訪談或親身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以獲得一手資料，故運用當前可及的資料庫和相關網路資源進行本文資料之蒐集。

對此，研究者使用中國知網（CNKI）及臺灣的華藝線上圖書館（Airiti Library）、Google Scholar、中國大陸政府網站和相關搜尋引擎進行研究檔案之蒐集。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研究者以中國大陸和另類教育為關鍵字在臺灣的華藝線上圖書館進行搜尋後發現，華藝線上圖書館中之繁體中文的研究成果有限；在刪除了新聞報導和評論性文章後，針對中國大陸另類教育發展之系統性的研究成果則尚未可見，此現象除了成為研究者欲進一步以繁體中文撰寫和研究該議題的出發點，亦使得研究者將檔案和研究資料蒐集的重心放置在中國知網、中國大陸政府部門網站、Google Scholar等相關搜尋平臺上。研究者運用另類教育、實踐教育、創新教育等關鍵字在中國知網資料庫進行搜尋後發現，中國大陸第一篇探討與另類教育相關之文章出現於90年代末期的1999年，而較多的討論文獻與研究成果則在千禧年後出現，且當前相關之討論和檔案文獻數量亦少於200份。撇除了新聞報導性文章、個人評論性文章以及介紹他國另類教育之文章後，探討中國大陸另類教育並符合學術社群要求之研究成果亦僅有數十篇之譜，在數量上可謂尚有很大的成長空間。而研究者在運用上述多個平臺與資料庫進行檔案與研究成果的蒐集方面，主要集中於2000年後至研究進行之2024年5月為止，將資料蒐集的時間範圍進行明確之框限的目的，即是希望所蒐集的檔案與研究成果皆是來自於一致之時間背景和脈絡下所產出，進而確保相關之檔案與文獻具備

研究意義上的可比較性。對此，研究者蒐集了探討中國大陸另類教育發展之相關的中英文學術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公告與檔案、媒體報導、學術評論性文章等，作為本文文件分析之主要的資料來源和依據。此外，研究者將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論視角梳理與探討中國大陸政府與民間社會的互動情形以及治理關係，並以此理論為基礎進一步地說明本文的分析架構。

肆、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在探討國家與社會關係時，常運用國家與社會兩者間權力的強弱作為認識該國家和社會彼此互動情形及國家治理職能（state governance capacity）強弱的切入視角，而一般來說，中國大陸被論者們歸類為「強國家」（strong state）「弱社會」（weak society）的類型，其原因除了目前中國大陸政府在體制上依舊是威權政體外，主要是根據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及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兩個面向標準所做的判斷。所謂國家自主性，是指國家在政策制定及追求國家發展目標時的自主性程度，擁有較高自主性之國家的政府，在進行政策討論和制定時，可以和社會多元之利害關係人保持較遠的距離，並且可在較大程度上依據國家和政府的立場與偏好，進行國家發展策略與公共政策內容的擬定。而擁有較強之國家能力的政府則是指，該政府與所屬之官僚體系在國家擬定了政策方案與內容後擁有較強的執行能力。回到中國大陸的脈絡，其被歸類為強國家、弱社會的類型，且其威權政府至今依舊維持著高度的國家自主性及較強的國家能力，換句話說，在當前的政府體系與治理環境下，其威權政府可較少考慮多元之利害關係人的觀點而擬定國家發展方向和政策內容，且即便該政策未獲得大多數利害關係人和團體同意，其官僚體系依舊可以憑藉著它強大的執行能力來貫徹與執行國家的政策目標（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強力封城與動態清零等政策皆是案例），在如是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民間社會和多元利害關係人對於國家已有定見之政策方向和內容的影響力是相對有限的（林顯明，2023；Zhang，2021）。

然而，吾人並不適合將國家與社會視為是兩個獨立運作的政治和社

會行動者，且一體性之國家與社會觀不僅可能落入研究方法上分析單位過於簡化的問題，亦有可能造成吾人在進行議題分析與探討時陷入二分法（dichotomy）的缺失。對此，有論者提醒，事實上政府的不同部門及政府在面對不同議題時，組織與官僚體系的立場和態度是有所不同的，而政府也並非是鐵板一塊；相反的，政府的不同組織、部門和行政官僚在不同的治理議題中是擁有能動性（agency）的，亦即政府組織與官僚體系可在不同的政策工具與實施方案中，選擇對於國家或政府而言較佳之執行方式和治理策略。對此，從國家與社會的理論來看，其兩者間的關係並非是靜態或固定不變的，而會因為所處的權力位置、特定議題或環境脈絡的不同而產生不一樣的互動方式，以及伴隨而來的多樣性和策略性的互動與治理行動之選擇（陳癸郁，2014）。

中國大陸的威權政府在教育領域治理的議題中，雖然強調要積極回應國際發展及制度現代化的發展趨勢，但依舊在其政府的政策文件中重申

……堅持把黨對教育事業全面領導制度體系放在首位，發揮政治引領作用。要全面總結與繼承百年來我們黨辦教育的根本經驗，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民辦教育領域黨的領導以及新技術新媒體與數字經濟環境下的治理新問題等關鍵領域與薄弱環節，建立健全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部門各負其責的教育領導體制機制……要在黨的全面領導下引領教育治理主體建設與教育治理相適應的認知、文化與環境氛圍，建立健全教育綜合治理制度體系。（袁玉芝、劉復興，2022）

換句話說，中國大陸的威權政府在面對國際社會發展及全球化趨勢下，其政府治理作為雖已做出些許的改變，但從其在政策文件中所標示的內容可見，即便在與政治較為無涉的教育治理場域中，堅持和維持中國大陸威權政府之優勢權力位置及以黨領政的基本政策並未改變。由此可見，當前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還是維持在強國家與弱社會的互動框架下進行運作。

對此，康曉光與韓恒（2005）的研究則進一步指出，雖然當前中國

大陸在威權政府下整體的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依舊是維持強國家與弱社會的互動格局，但並不代表其政府與國家力量在面對不同社會團體與組織時皆使用相同的治理和對待方式。相反的，康曉光與韓恒運用「分類控制」的概念進一步說明中國大陸政府對待不同社會團體與組織時不同的控制力道和政策工具之使用。該研究指出，中國大陸政府在決定如何對待特定之社會行動者時所考量的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幾項：中國大陸政府對於特定社會組織成立的態度為何（歡迎、鼓勵、默許或是禁止）、中國大陸政府是否設有職司管理特定種類社會團體的部門或任由其自主發展、特定的社會團體與組織之負責人的產生方式是否可自行任命或需政府任命、社會團體與組織在進行重大事項之決策時是否有自行決定的空間或需經由政府相關部門與單位審批、以及中國大陸政府是否會運用行政手段或政策工具去對於特定之社會團體或組織進行經費和預算的控制與日常活動舉辦權之審批等，在在都會影響到中國大陸政府選擇採用何種手段及政策工具來對待、管理和控制特定之社會力量、團體與組織。從上述討論可知，即便如中國大陸般之威權政府，其政府組織在面對、治理或控制不同的社會力量、團體或組織時也並非鐵板一塊；相反的，在如中國大陸一樣之強國家中，政府選擇其社會控制與治理手段時的自主性和能動性是高的，而非一成不變的（Saich, 2016）。

伍、國家與社會關係分析架構

Negoita（2018）綜整了相關文獻，並以國家和社會彼此間的鑲嵌性（embeddedness）以及國家在面對特定社會團體、組織與力量時的自主性和能力等構面進行歸納後提出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六分類的分析架構（如圖1）。首先是「保守鑲嵌型」（conservative embeddedness），在此種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類型中，政府選擇了和特定之社會菁英團體（例如地主）保持著緊密的互動關係，卻和其他社會組織與團體保持較遠的距離（arm's length），其目的是為了社會控制，防止社會跨階層和階級者組成新的政治或社會聯盟來挑戰它的治理正當性，並藉此維持社會既有的秩序與權力位置。其次為「創業性鑲嵌型」（entrepreneurial embeddedness），此類型的互動特徵展現在國家和具備資本力量的資本

家菁英（capitalist elite）維持著緊密互動乃至於政治聯盟的關係。其形成的原因在於，大多數的資本家菁英對於直接介入政府事務或者政治治理並無明顯的動機與興趣，但當一國內部之資本家菁英想要在國家範圍內之市場中獲取高額甚至超額利潤時，在多數的情況下會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及資源的挹注，因此，國家與資本家菁英一同進行社會控制和維持穩定的政治工作就變得有利可圖。而過去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的經驗所建立起來之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就被歸在此類型中（Evans,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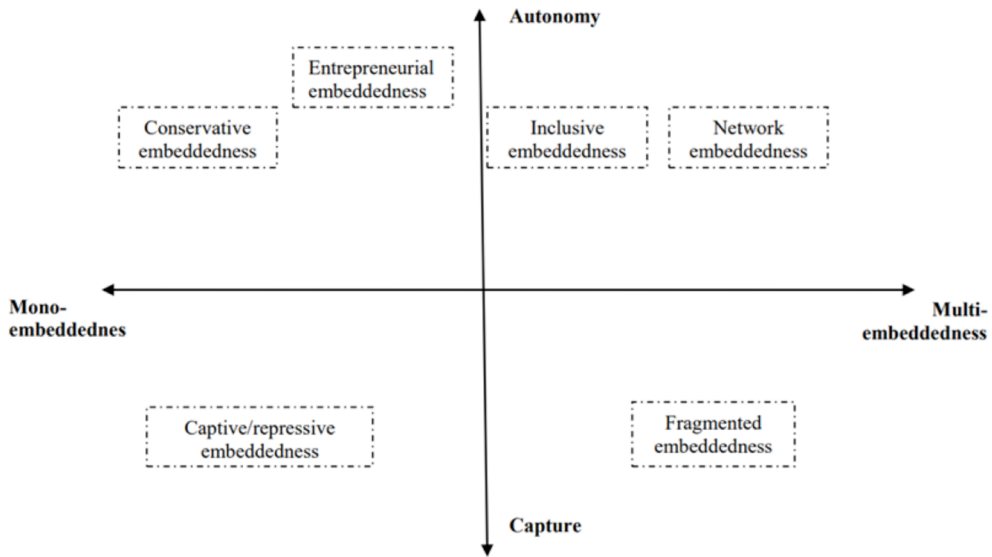


圖1 Negoita國家與社會關係六分類架構

資料來源：Negoita, M. (2018). The always embedded state: Six types of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 8, 176.

再次則是「包容性鑲嵌型」（inclusive embeddedness），此類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較具互補性和互賴性，換句話說，國家對於讓渡部分權力（利）予社會團體、組織和力量，以協助國家和政府推動特定之公共事務或者社會服務的態度和立場是開放的，而這種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類型較明顯地出現在二戰後的部分西方國家。而「網絡鑲嵌型」（network

embeddedness) 通常是從包容性鑲嵌型發展而來，此種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屬於當今較新的發展趨勢，目前仍有許多國家之政府尚在摸索如何與眾多且多元之社會團體、組織和力量發展出交織和綿密的網絡性互動關係。多數國家在建立此類型之互動關係時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在於如何改變過去將社會視為是站在國家與政府對立面之物 (subjects)，轉變成將其視為是推動國家發展及公共事務之夥伴 (partners)。如是角色轉變，不僅牽涉到國家對於自身價值和角色定位的認知，也將根本性地動搖了傳統之國家與社會彼此間上下的互動關係 (Papadopoulos, 2003)。

「碎片化鑲嵌型」(fragmented embeddedness) 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之互動特徵，展現於當一個國家內部存在著許多政治與社會菁英或團體試圖對於國家之事務與權力結構擁有影響力，但卻未有任何一個政治或社會菁英團體能真正壟斷國家的權力運作。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反而弱化了國家作為行動者的自主性和國家能力，因此，此一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類型所可能形塑的是一種弱國家強社會的互動關係。最後則是「俘虜／壓制性鑲嵌型」(captive/repressive embeddedness)，此種類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特徵表現在一國內部出現了在權力上擁有壓倒性力量的政治或社會菁英團體，而此團體不僅可以摒除其他行動者在國家中的權力施展，甚至還能壓制或剝奪其他與之不同的聲音或團體的權力空間。此類型的國家主要以獨裁、威權和共產國家為主。在這些國家當中，共產黨或獨裁和威權的政府即是國家與社會關係中擁有壓倒性之權力的施展者，而與之不同的意見者不僅可能因此被消音，甚至被剝奪相關權力施展的機會。對此，Negota所提出來的分析框架，提供吾人運用宏觀及統整性的觀點，以理解個別國家在面對、控制與治理不同公共事務議題和社會組織和團體時，所呈現之國家與社會互動特徵的分析基礎。

陸、中國大陸另類教育之治理：從國家與社會關係角度分析

研究者將依序針對中國大陸五種另類教育類型（在家上學、華德福學校、讀經學校、教會學校及創新學校）的發展狀況進行梳理，並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論觀點進一步地分析中國大陸政府如何面對、治理乃至於控制另類教育體系。

一、在家上學

在家上學的另類教育類型在中國大陸發展較早，約在時序進入新世紀的初始時，就開始出現部分家長，因考量到他們的孩子較無法適應體制內學校的生活，或者對於正規教育環境過於著重考試、升學及同儕競爭的學習環境產生疑慮等因素，選擇了不將尚處於義務教育年齡的孩子送到由國家所主導的體制內教育體系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在家上學之教育模式的出現，主要是集中在經濟較發達之城市的中產階級、高收入或高教育背景的家長群體和家庭中，這些具備較高社經地位和教育程度的家長主要認為，中國大陸傳統和正規教育體系過於強調升學競爭的單一思維，致使學生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無法獲得充分的尊重及和諧的身心發展。據統計，在2013年時，中國大陸在家上學的學生人數已有約1.8萬人，而此一數值到了2019年時進一步成長到約2萬人左右（Bridgeway Academy, 2022）。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家上學的教育模式並不符合中國大陸義務教育法之相關規定，該法規第二條第一款明訂

義務教育是國家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的教育，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

且該法律條文所定義的義務教育實施場域需為學校，在此情況下，選擇不將適齡學童送到由國家所辦理之義務教育學校是一種違法的行為。雖然如此，中國大陸政府對於這樣的教育實踐行為及另類教育模式所採取

的態度卻是一種較為曖昧和默許的立場，其可能的原因在於：在家上學的另類教育實踐方式並不具備威脅中共政府統治權正當性的問題與疑慮，再加上選擇將孩子留在家中進行教育的家長需全額負擔相關的教育支出，因此，在不會排擠或使用到政府部門原本所編列之教育經費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政府對於少數家庭選擇在家教育孩子的另類教育形式採取了較為容忍的態度與立場（Sheng, 2018a）。

上述態度和立場亦表現在中國大陸政府對於在家上學家長團體於互聯網上之串聯與聯盟形成的過程當中。其中，由施行在家上學之家長和團體所共同組成的「在家上學聯盟」網站於2013年正式在騰訊的QQ群組成立。在這個虛擬社群成立前的2011年時，中國大陸重慶市就有7個家庭的家長選擇不將他們的孩子送到正規教育的學校環境中進行學習，而是透過互助與相互支持的方式，在彼此所居住的小區（社區）中租下了一個空間，作為這7個家庭的孩子進行學習和共同執行在家上學之教育場域。尤有甚者，中國大陸在家教育聯盟與21世紀教育研究院於2013年8月在中國大陸舉辦了首場的在家教育國際研討會，並在研討會後發表「在家上學北京共識」，呼籲中國大陸政府應將在家上學視為是義務教育的一種合法和可接受的形式，也認為在家上學不僅攸關學生權益和家長之教育選擇權，其合法地位之取得亦符合聯合國相關宣言中對於兒童及學生教育權保障之意旨（張瑞芳，2016）。

綜上所述，雖然在家上學在中國大陸已被許多高社經地位和教育程度較高之家長所選擇，但其仍處於法律不合法而實際有在運作的灰色地帶中。中國大陸政府對此教育模式持曖昧和默許態度，並未明確禁止。且隨著在家上學的另類教育已在中國大陸有了十數年的實踐經驗，致使整體中國大陸之政府、社會和學術界對於推動在家上學的合法化工作已有相當的共識，但如何具體施行則仍待進一步討論。對此，從國家與社會互動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政府對於不具顛覆性且不使用政府經費的在家上學之另類教育形式，持曖昧和默許的態度，而在國家與社會互動策略的選擇上則和包容性鑲嵌的類型較為類似（Sheng, 2018b）。

二、華德福學校

在多個來自西方的另類教育思維與模式中，華德福學校系統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情形最為快速也最具社會影響力。第一所華德福學校於2004年在成都市成立，如今，該所學校已成長為一個擁有超過500個家庭和上千位學生，且橫跨幼兒園至中學之完整的教育系統。2004年後，中國大陸包括上海、北京與深圳等城市也都相繼有個人或團體投入華德福學校設立的工作；截至2019年止，中國大陸已有超過400所華德福幼兒園、70所華德福小學及5所華德福教育訓練中心，由此可見，華德福教育體系在中國大陸的快速發展情形。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另類教育整體在中國大陸的法律體系中依舊處於灰色和模糊的地帶，但已有部分華德福學校獲得了地方政府的承認並賦予合法性地位，例如第一所於成都成立的華德福學校，就在2012年時，成為第一批被中國大陸政府承認合法性地位的華德福另類教育學校，其他包括在北京、上海、廣州與珠海等地也都有華德福學校獲得了地方政府所認可之合法性地位（Sun, 2020）。

華德福體系學校在中國大陸之教育及法律環境中逐漸地取得了正當性和合法性地位後，近年來則是積極地追求將華德福教育在「中國本土化」的目標，藉以回應中國大陸日益高漲的國族主義和中共教育意識形態的期待與需求。其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8年所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中明確指示：

……要不斷使教育同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要求相適應、同人民群眾期待相契合、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

並在會中進一步表示，不能僅是直接援引或挪用外國的教育思維和理念到中國大陸的教育環境中，而是要堅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教育思維下，不斷地探求將相關教育思維、理念和作法在中國大陸進行本土化的目標（俞可、陳雅璐，2018）。在習近平提出了上述的教育發展方針與本土化目標後，具備官方色彩的「人民智庫」旋即於2019年5月發起「新時代如何推進國際教育資源本土化——成都華德福學校教育實

踐創新專題調研」的課題和專題報告。需進一步說明的是，中國大陸政府願意透過轄下具有官方色彩之智庫來探討特定之教育議題，其所代表的意義即是中國大陸政府對於此一議題所持之立場與態度是相對開放的（Huang et al., 2015）。由此可知，特定之社會團體或教育組織若欲從中國大陸政府那邊獲致較大的發展與合法性空間，勢必相對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並在最大的程度上配合中國大陸政府的政策方向及政治和教育意識形態的要求。

為了回應將西方教育思維與理念在中國大陸進行本土化的政治目標，2019年人民智庫於上述調研會議完畢後，進一步發表了題目為「新時代國際教育資源本土化之路與成都華德福探索」的調查研究報告。該報告揭示了華德福教育體系邁向本土化之具體教育作為包括以下數項：

1. 教學內容的本土化：部分中國大陸的華德福學校在課程內容中，融入了對於家鄉地理、環境、植物、動物、文化、田野調查及實際體驗等教學活動和議題的探索，甚至在學校的課程中特別規劃傳統中國及華人文化重要節慶活動的說明，例如清明、端午、中秋與冬至等社會文化議題的傳承與介紹。如是的課程內容安排，即是希望華德福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在受到西方另類教育思維的影響下，依然能夠保有甚或是強化他／她們對於傳統中國文化的認同感。在此份報告中進一步提到，有超過七成之華德福學校的家長表示，學校透過將上述具有高度本土化和中國傳統文化議題的內容融入到課程架構中的作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新有著深刻和正面的影響。

2. 教育資源及教學人員的本土化：此一面向強調的是，在教學資源的運用方面不能僅依靠移植或單純地運用西方的教材和教法而自滿；相反的，在中國大陸政府強調發展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意識形態的政策指導下，華德福學校也必須在進行教學資源的開發與採用的過程中，更加著重和強調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將中國大陸之特色和特性融入既有西方另類教育思維與教材教法的重要性。另外，中國大陸華德福教育系統也強調教學人員本土化的重要性：不同於其他在中國大陸辦學之國際學校將外師授課作為招生的亮點與優勢策略，華德福學校則更著重於強調培養中國本土教師的重要性，並將外籍教師視為是協同教學的角色。

3. 家委會的建立與運行：家委會可謂是華德福教育在中國教育本土化過程中的另一具體實踐，對此，華德福學校強調將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結合的重要性，並認為家長和學校彼此間為「同呼吸、共命運」的關係。在打造緊密之家長與學校互動關係的思維引導下，家委會透過頻繁之家長和學校活動的舉辦，例如：家校共同管理農耕菜園、家長合唱團、偶戲班、讀書會等，希望學校和家長間能建立起頻繁的互動及和諧的協作關係（石晶等人，2019）。

綜合上述討論可知，華德福教育系統和中國大陸政府的互動關係較為良好，不僅促使部分華德福學校獲得地方或城市政府之合法性地位的賦予及辦學正當性的承認，中國大陸中央政府甚至為了推進華德福教育系統的本土化目標，委託具有半官方色彩之智庫機構進行相關調研工作並發表研究成果。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看，中國大陸政府對華德福教育系統採取較為寬容態度的重要原因之一為：華德福教育體系願意配合執行中國大陸政府的教育政策並發展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之教育意識形態，故能獲得來自政府的回饋與正面影響。對此，華德福教育系統和中國大陸政府的互動關係較似於「包容性鑲嵌」類型。

三、讀經學校

另外一類與特定宗教或文化思想有關的另類教育則包括讀經學校和教會學校。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政府在面對這兩類之學校時的態度和治理方式有所不同。

在經歷過了1950~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對傳統華人社會儒家思想造成之不可逆的負面衝擊和影響後，中國大陸政府有意識及有計畫地在1990年代開始推廣和復興儒學思想及儒家文化，儒家所代表的教育理念及對於閱讀和背誦儒家聖賢經典作品的教育思維，也重新回到中國大陸的教育現場和學校的學習環境中（Billioud & Thoraval, 2015）。而如是之政治氛圍及社會脈絡的發展與變遷，再配合來自臺灣之王財貴教授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兩地積極鼓吹讀經教育之重要性的推波助瀾下，讀經教育於1990年代在中國大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對此，許多由私人、個人或團體所創立的讀經學校也在中國大陸各城市中出現。這種強

調大量閱讀儒家聖賢經典的另類教育類型，確實在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成為了部分未能適應中國大陸體制內教育之學生和家長的另一類選擇，且推廣和復興儒家思想和經典，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了中國大陸政府試圖運用儒家思想和文化中所強調之社會階層化理念（君、臣、父、子），及社會教化之重要性作為社會控制的思維相互呼應。由於推廣和復興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對於政權及控制社會有所助益，因此，當時讀經教育在中國大陸社會的流行和讀經學校的相繼成立皆被中國大陸政府所默許。據統計，讀經教育機構和學校在中國大陸最為興盛之時期於各城市的設置數量超過五千所，有逾萬名以上的學童選擇了讀經學校作為他／她們獲取知識和接受教育的地方（Wang & Billioud, 2022）。

然而，1990年代及千禧年初期以王財貴教授為代表之讀經教育思維，過於強調記憶及重複背誦的重要性和學習方法，卻忽略了讀經學校學生在閱讀和背誦儒家經典文本以外之教育和社會技能的培養，因此逐漸使得中國大陸社會和將孩子送到讀經學校就讀的家長對於讀經教育之成效產生質疑。王蓺之（2020）研究指出，中國大陸讀經教育及讀經學校在經歷了逾二十年的熱潮後，出現以下數項問題與挑戰，包括：

（一）對於文化經典的推廣與傳承有明顯的偏頗：讀經教育被窄化成僅是讀儒家經典著作的教育，而過於強調儒家經典之朗讀和背誦的教學方法、以及僅著重於儒家經典和人物介紹而忽略其他和中華文化教育思想有關之理念的傳遞與引介等，皆使得讀經教育在當代社會脈絡下所能展現出來之教育和社會價值為何等問題，受到愈來愈多中國大陸家長的質疑；（二）教學形式過於簡單：讀經教育在中國大陸的實踐過程，被家長和社會質疑的另一個重要面向即為其教學形式過於簡化和單一。在許多讀經學校中，教學方法主要是以教師引領學生針對經典之內容進行反覆性的背誦與閱讀，卻對經典內容之意涵講解著墨甚少。另外，僅強調背誦而不重理解的教育方式也使得讀經教育在評量學生學習成效的過程中，缺乏一套有效的評估方法，致使降低了讀經學校的教育品質和穩定度；（三）填鴨與背誦式教育降低學生學習熱情和動機：在教育過程中，如何培養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過於強調反覆背誦之讀經教育所造成的另一影響，即是學生學習熱情與動機的降低甚或是消滅，對此，不僅使得讀經教育無法達到推廣和傳承儒家經典的

教育目標，反而造成學生因對經典學習的動機和熱情盡失，進而不再願意學習儒家經典的負面影響。

上述讀經教育在中國大陸實踐經驗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得中國大陸政府對於讀經教育和讀經學校的辦學立場與態度有所轉變。例如，具有中國大陸官方色彩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和人民網分別於2013年及2019年刊登了標題為〈讀經謹防三個偏向：將經典的內容功利化、庸俗化〉及〈被異化、退學等 最早一批“讀經少年”怎麼樣了？〉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雖然書寫的時間不同，但它們皆直指了過往讀經教育作為中國大陸另類教育的一種形式，對於教育乃至於社會文化意義上造成的許多問題。其中，原本立意良善的經典閱讀與背誦，後來逐漸轉變成為了背誦而背誦之「異化」(alienation)的結果，不僅使得讀經教育原本所標榜的教育理念受到負面影響，且從讀經學校畢業後之學生回到主流社會和勞動市場後常產生嚴重的適應問題，在在都讓讀經教育的實踐經驗及其所代表之教育理念受到質疑(人民網，2019；邊家珍，2013)。對此，Wang (2022) 針對讀經學校畢業學生所進行的研究發現，隨著學生之年齡增長和人格養成，讀經學校所符應和推廣之儒家文化思想，被許多畢業學生認為是壓抑他／她們獨立自主發展和自我認同展現的文化壓力來源。也就是說，讀經教育裡所推廣和傳承之儒家文化，包括較具權威性的學校權力、師生關係、親職教養方式及重複性與記憶式之教學和學習策略等，在在都成為了許多擁有讀經學校學習之經驗者，選擇不再繼續於讀經學校就讀、或對於此類型之另類教育型式給予較低評價之原因。

尤有甚者，有論者認為僅強調背誦、記憶，但不著重理解的中國讀經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已出現宗教化的現象，在這樣的教導和學習模式下，儒家所代表和所欲傳達之教育理念與觀點被不假思索地傳播，因此，這些儒家經典及所代表的教育思維也就不存在較大之理性思辨和討論的空間。上述相關的發展情形是中國大陸政府和社會所不樂意看見的結果，故驅使中國大陸政府改變過去對於讀經教育較為寬容的態度，而於近年來正式地發布相關政策作為其關閉讀經學校的法源依據(Lizhu & Na, 2015)。其中，中國大陸政府教育部於2019年公布「關於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這個政策通知的法律內容賦予了

中國大陸政府據此關閉以社會培訓或終身學習為名的各類讀經班、國學班、私塾或讀經學校等的權力。雖然，目前尚未有官方所公布之統計數據顯示在此政策通知公布後，實際有多少間的讀經學校或相關類似之教育機構被關閉，但可以確定的是，此一政策通知的發表無疑是中國大陸政府調整其對於讀經教育和讀經學校之態度和立場的明顯展現（鳳凰網，2019）。

而從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關係來看，過去一段時間（1980-1990年代間），由於推廣和傳播儒家思想和其所代表之教育思維，有助於中國大陸政府對其社會和教育體系進行治理與控制，因而讀經教育和讀經學校在過往一段時間獲得了較寬廣的發展空間；然而，讀經教育和讀經學校在千禧年後的發展、及其所造成對於畢業生適應實際生活和回歸主流勞動力市場產生困難等情況下，使得中國大陸政府一改過去對於讀經教育較為寬容的態度並轉向縮緊讀經教育和讀經學校的發展空間（柯小剛，2017）。對此，中國大陸政府和讀經教育體系的互動關係可謂從過往較類似「包容性鑲嵌」走向「壓制性鑲嵌」的互動模式。

四、教會學校

在討論教會學校於中國大陸之發展情形時，就必須先梳理中國大陸政府對於不同宗教信仰的看法與態度，以及不同宗教信仰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情形。雖然中國共產黨對於宗教信仰的立場是奠基在無神論（atheistic）的基礎上，但中國大陸政府對待一般民眾和共產黨員之宗教信仰的態度有所不同。中國共產黨於1982年所制定的中央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指出：

黨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對我國公民來說的，並不適用於共產黨員。一個共產黨員，不同於一般公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成員，毫無疑問地應當是無神論者，而不應當是有神論者。（楊春雪，2019）

基督教已名列中國大陸政府所承認之五大宗教信仰之一，近年來在中國

大陸的發展亦有明顯的增長。據統計，目前在中國大陸以基督教為信仰的人數近億，且有相關的預測表示，若信奉人數與成長幅度不變的話，至2030年時中國大陸之基督教信徒人數可能高居全球之首（基督教日報，2019）。然而，帶有西方色彩之基督教信仰在中國大陸的快速發展並非是中國大陸政府所樂見，對此，由於中國大陸政府和共產黨對於源自西方之宗教信仰的不信任，在1950年代起即將中國大陸的教會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分離，以預留中國大陸政府可以將手伸入到宗教組織中進行管理與控制的政治空間。

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政府將教會型式分成兩種類型，一是願意配合中國大陸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愛國教會」，因其配合度高，故信徒們在教會中進行禮拜以及相關宗教儀式或活動時，較少受到來自政府部門的干擾。另一類型的教會則是一般所稱的「地下教會」，其無論是在政治立場或對於宗教信仰的觀念上都和中國大陸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有著很大的差距，故信徒們在教會進行禮拜或集會時，常遇到政府的干擾與刁難，使得許多原本參與地下教會集會或禮拜活動的基督教信徒們在人身安全的考量下，選擇將他們的集會和禮拜活動改在私人的場域當中舉辦，進而出現了所謂的「家庭教會」（Koesel, 2013）。

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教會學校的設立成因，許多都和家庭教會成員之家長對於中國共產黨所持之無神論的宗教意識型態感到不滿有關，因此，此一類型之另類教育的教學活動場域也大多設立在信徒個人的居住地點或私人空間中，或是直接設立在城市家庭教會（urban house churches）當中。由於此類型之另類教育重視對於宗教信仰和靈性的探討，因此，在課程內容的規劃與設計上，除了主科的數學、科學、英文和社會科學等課程外，也會進一步融入聖經研究（Bible studies）等相關課程與學習內容（regular courses）。據研究統計，2018年時約有5,000位學齡孩童選擇赴私人或由基督教會所舉辦之教會學校就讀。

然而，近年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擴大了對於中國大陸基督教會集會和禮拜活動的控制與監管，甚至在多個省份中拆除了數千間的基督教會，以增加中國政府對於宗教事務和基督宗教的控制能力。在此情況下，一個合理的看法認為，因基督教信仰和教會集會活動被中國大陸政府強勢打壓，家庭教會成員之學齡孩童選擇參與家庭教會學校的人數應

有進一步的成長（Sheng, 2018c）。從上述的討論可知，無論是從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對於黨員應是無神論者，或是近年來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加強對宗教信仰及相關活動控制程度等因素的影響下，在在都使得中國大陸政府和基督教會、信徒及所代表之另類教育型態的關係處於較為緊張甚至衝突的情形。對此，有論者認為，當前習近平政府試圖以教會學校不合法為由，打壓由基督教信徒私人、團體或教會組織所創辦之教會學校的方式，達成其欲對於基督宗教事務及相關活動加強控制的效果。

對此，從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觀點來看，中國大陸政府對待教會學校的模式和「壓制性鑲嵌」類似，亦即在教會學校和中國大陸政府互動的過程中，教會學校所擁有的空間、自主性及組織決策能力都是相對有限的。相反的，中國大陸政府可能出於治理的需求，或共產黨對於宗教組織所持的意識形態，進而對於教會學校之教學方式和所代表之教育理念進行單向和高壓的控制。而近年來中國大陸政府所陸續發布的政策，包括「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及「關於未成年人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參加宗教活動的倡議書」等，都在要求宗教組織和相關之宗教活動必須加強中國化和本土化的目標，而未能在此過程中配合中國大陸政府之方向者，將面臨到來自政府更加嚴格的介入與管控。另外，有關未成年人不得信仰宗教以及不得參加宗教活動之政策方面，也標示了中國大陸政府欲進一步管控具有宗教組織性質之各類型學校和教育系統發展的空間，教會學校即是中國大陸政府所欲加強控制和管理的主要對象之一。因此，近年來中國大陸各地之教會學校被強迫解散、關閉或被拆除的消息時有所聞，不僅導致了成百上千的教會學校學生面臨失學的窘境，且中國大陸政府對待教會學校的態度和立場，也正說明了中國大陸政府和教會學校兩者間互動關係處於「壓制性鑲嵌」的例證（Christian Evangelical City Church, 2024）。

五、創新學校

最後，則是有關創新學校類型之討論。在此所謂的創新學校較類似於一種傘型的概念，亦即創新學校的類型及其實踐方式並非僅有一種可

能，而是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教育實踐和表現方式。

例如，成立於2006年的日日新學堂，所標榜的是一種透過家庭互助的方式來促進學生學習的一種另類教育模式；作為一個家庭（長）互助形式的另類學校，日日新學堂的經費來源及學校營運大多是由學生的家長們進行共同的管理和風險分攤。因此，日日新學堂的家長們組成所謂的「家校委員會」，並在這個委員會內進一步成立多個行政小組，包括生活組、教學研究組、成長組和活動組等。而在教學內容方面，日日新學堂也不完全採用中國大陸政府所審議通過的教科書；相反的，此一另類學校蒐集不同國家的課綱和教科書內容，透過重新編寫的方式來進行內容的統整與教材自編的目標（留學，2022）。另外，成立於2014年的明悅教育機構則是一所強調靈性、生命回歸自然狀態和生命、生活與生態（三生）等具環境主義觀點的另類教育學校。在這樣一間強調探索與學習生命本質重於學科知識的教育機構裡，體育、心理、音樂與美術等課程的重要性被排在主科的學習之前，他們認為學生在學習學科知識之前必須要學會和自己相處、處理自身的情性並能夠友善地對待吾人所居住的地球、環境和世界。對此，明悅教育機構的辦學宗旨和理念為期望培養學生成為能夠融會貫通中西文化、心懷天下的世界公民（北京博雅明悅學校，2022）。

而成立於2018年的T School則是一所標榜在圖書館中的學校，其重視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和自主學習能力，且認為在當今資訊量爆炸的時代，培養學生靜下心來閱讀和獨立思考能力才是能夠讓學生免於淹沒在訊息洪流的方法。因此，明悅教育機構將較大的學校面積建設成開放式的圖書館，其目的即是希望學生能培養出自我學習和探索知識的能力。為了讓學生自我學習並進行知識探索的時間能不受過多的限制，因此明悅教育機構標榜它們的校園每天開放12小時、每年開放300天，藉以達到全天候開放並讓學生能夠全天候自我學習的目標（挑戰者，2018）。另外，於2020年設立於北京市的提雅學園（Theia Academy），是一所以國際教育為發展主軸的全球化學校，其課程內容和規劃並非依循在主流或特定的教育思維，相反的，提雅學院強調所提供的課程和知識內容是建立在教育創新實踐及對於傳統教育思維的反思基礎而來，並在這樣的思維下培養學生能具備自我照顧且可和社會他人一起共好的能力，並進

一步成為照亮社會的教育目標（提雅學園，2021）。

對此，中國大陸創新教育機構在經歷了千禧年後至2010年期間的快速發展後，目前有多所學校在受到「國進民退」的政策思維影響下被政府強迫關閉或遷校。Wang和Chan（2015）針對創新學校與中國大陸政府互動關係的研究發現，國際學校大多採取隔離（isolation）的策略來和中國大陸政府保持距離，藉以爭取能夠自主辦學的空間；私人贊助的學校則多採取迴避（avoidance）的互動策略，亦即在能不和政府打交道的情況下，盡量減少和中國大陸政府互動的頻率；而願意配合中國大陸政府之教育政策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創新學校，則有較大的機會採取擁護或倡議（advocacy）的互動策略，以獲取對其生存與辦學有利的位置和空間。Chan和Wang（2024）也指出，中國大陸政府在面對各類之創新學校時，並非全面性地選擇將學校進行關閉或拆遷，而是如Chan和Wang所發現的，會依據創新學校與政府的距離、互動關係和政策配合度等指標來決定對待與控制學校的方式。

因此，從國家與社會互動的觀點來看，中國大陸政府和創新學校的互動關係與「保守鑲嵌型」較為類似，亦即中國大陸政府會選擇性和策略性地決定國家對待特定教育系統和學校的方式。尤有甚者，中國大陸政府會有意識地對某些能夠符合政府需求和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創新學校展現出較寬容的態度，但選擇和某些教育系統或另類教育型態之學校保持距離甚或是採取強硬搬遷、停校或拆除的對待方式。

柒、結論與討論

從上述研究者的討論與分析可知，本文的研究關懷在於詢問：具有批判主流和正規教育意涵之另類教育體系，是如何在一個政府體制依舊處於威權且教育和社會領域尚未獲得完整之自由權利的國家中生存與發展呢？而本文以擁有全世界學齡人口數最多之中國大陸為例，探討威權之中國大陸政府如何面對與治理另類教育，以及在此過程中不同之另類教育體系和中國大陸政府所建構出來之互動關係與特徵為何？帶著這樣的研究好奇，研究者透過文件分析法的運用，閱讀和中國大陸另類教育相關之檔案資料，包括學術研究成果、政府政策文件、政府與民間相關

之報告及新聞報導等內容，並透過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之理論的運用，以回答研究者的核心關懷及所提出之研究問題。

研究者將本文的研究發現整理成表1。從表中綜整的內容可知，中國大陸政府在面對不同之另類教育類型時的態度與治理策略展現了組間的差異，亦同時存在組內治理模式隨著時間或社會脈絡不同而變化的情形。從國家與社會互動的觀點來看，中國大陸政府當前對於在家教育和華德福學校的態度較為寬容和接納，對於具有（類）宗教色彩之教會學校和讀經學校的態度較為強硬；相對下，中國大陸政府和創新學校的互動情形則展現出了較多的差異和多樣性，而不同類型之創新教育學校亦各自發展出了和威權政府互動的策略，包括隔離、迴避及擁護等，皆是學校在衡量了它們與政府的關係和親疏遠近後的互動策略性選擇。對此，本文的研究發現呼應了過往針對中國大陸政府與社會互動關係文獻所提之分類控制的觀點，亦即中國大陸政府在面對社會上之不同行動者、群體或利害關係人時，所採取的態度和治理策略並非是一成不變的；相反的，中國大陸政府會依照不同行動者和利害關係人與政府的互動關係、對政權的威脅程度和配合及順服政府政策、或共產黨之意識型態的程度等條件，決定其應對和治理的方式。而在另類教育的場域中，中國大陸政府採用了包括包容性鑲嵌、壓制性鑲嵌和保守性鑲嵌等互動策略，來對待和治理不同類型的另類教育體系。

表1

中國大陸政府與不同另類教育體系的互動關係

另類教育類型	中國大陸政府態度	國家與社會互動類型
在家教育	●在不具備對於政府合法性以及正規教育產生顛覆性影響以及在不使用到公部門之教育經費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政府對此一另類教育類型採取曖昧與默許的態度。	●較屬於「包容性鑲嵌」，亦即雖然在家教育在目前中國大陸的法律體系下依舊尚未獲得完整之合法性地位，但政府對此類型之另類教育實踐行為逐漸持較為包容的態度。
華德福學校	●面對華德福教育體系及其學校在中國大陸的快速發展，中國大陸政府採取接納和包容的態度作為因應，但也期待華德福學校能以推進教育本土化來回應政府之善意。	●華德福學校與中國大陸政府的互動關係和「包容性鑲嵌」較為相似，部分中國大陸地方政府不僅承認了華德福學校的合法性正當地位，中央政府也為如何推進其本土化進程而創立相關調研課題也允許其營運事實。
讀經學校	●中國大陸政府對於讀經學校的態度在前期時是採取較為包容的態度，但近來讀經學校所產生的各種對於學生學習和社會之影響後，中國大陸政府對於讀經學校的態度轉趨保守與嚴厲。	●中國大陸政府前期與讀經學校的互動關係較似「包容性鑲嵌」，然而，後續讀經學校所引發與產生的各種教育和社會問題，以及中國大陸政府縮緊對於思想教育的控制後，兩者的互動關係即進一步地轉變成「壓制性鑲嵌」的類型。

(續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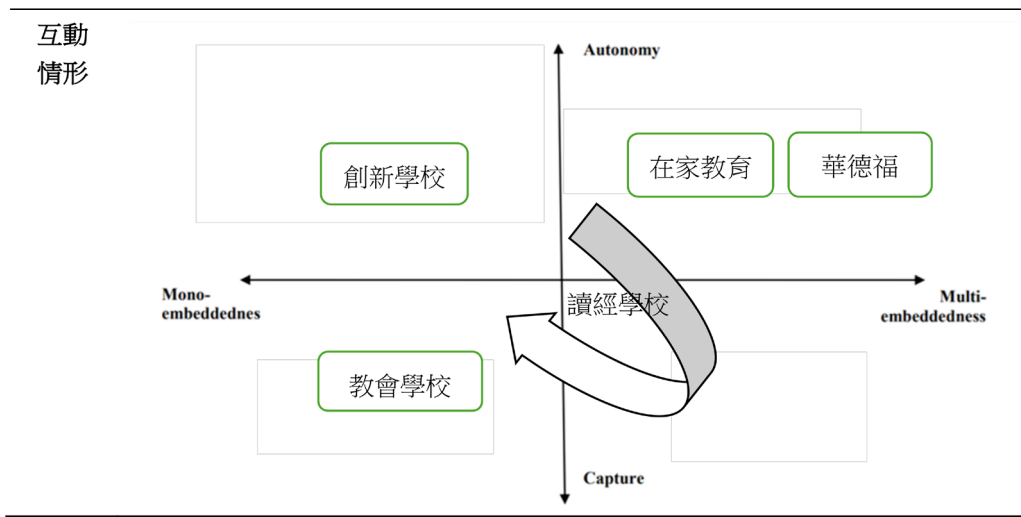
教會 ● 中國大陸政府在受到中國共產黨無神論之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對於宗教事務的控制一直以來都較為強烈，因而在中國大陸有所謂願意配合政府之愛國教會以及較不願意配合政府之家庭教會兩種類型。

學校 ● 由於教會學校大多是由不滿中國共產黨的無神論意識形態之家長團體所建立，因此，一直以來教會學校和中國大陸政府的關係較為緊張。近年來，中國大陸政府陸續頒布了數項法律來加強對於宗教事務和信仰的管理和控制，亦關閉了許多教會學校。因此，兩者間的互動關係較似於「壓制性鑲嵌」的類型。

創新 ● 中國大陸創新教育學校在千禧年至2010年間因政府較為寬容的態度獲得了擴張與發展的機會，但近年來，在受到中國大陸政府所執行之「國進民退」教育政策的影響下，許多創新學校發展出了和政府互動的多元策略和方式。

學校 ● 由於創新學校的類型多元，因此不同類型之創新學校和中國大陸政府所建構出來的互動關係也有所不同，例如隔離、迴避和擁護。對此，中國大陸政府在面對不同類型之創新學校時的態度與方式也有所不同，因而彼此建立起了較似於「保守性鑲嵌」之互動模式。

(續上頁)



此外，由於目前在中文文獻中針對中國大陸另類教育發展情形之研究與探討依舊相當有限，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適時地補足了當前研究之不足，並且研究者透過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理論之引介與運用，亦進一步拓展了對於此一議題和領域的認識與瞭解。然而，在本文的研究限制方面，由於考量到資料的可及性和當前兩岸關係等問題，故本文的研究資料主要是以已出版之研究成果和文件檔案等次級資料為主，對此，未來的研究或可進一步思考蒐集質性或量化之一手資料的可能性。另外，本研究僅就中國大陸另類教育的發展情形及其和政府間的互動關係進行探討，未來或可將此一研究領域與視野，拓展至比較東亞其他國家或威權國家之另類教育在不同環境與脈絡下的發展情形，和所在國社會相應所建構出來之多元與不同的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等議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和比較研究。

參考文獻

- 人民網（2019）。被異化、退學等 最早一批「讀經少年」怎麼樣了？
<http://edu.people.com.cn/BIG5/n1/2019/0726/c1053-31257598.html>
- 【People CN. (2020). *The alienated and dropouts: What happened to the first batch of 'classics-reading youths'?* <http://edu.people.com.cn/BIG5/>

- n1/2019/0726/c1053-31257598.html】
- 王楠（2020）。一所中國大陸另類學校發展之研究——理念與實踐的落差（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Wang, N. (2020). *The development of an alternative school in Mainland China: The mismatch between ideal and practi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王蓺之（2020）。關於當代兒童「讀經熱」的反思。文化產業旬刊，14(159)，144-145。
- 【Wang, Y.-Z. (2020).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classics-reading craze' among children. *Culture Industry*, 14(159), 144-145.】
- 北京博雅明悅學校（2022）。北京博雅明悅學校——校招簡介。http://career.bnu.edu.cn/userfiles/db77e711225a4a83a14420a4fa8e2ee7/files/cms/article/attachment/2022/05/%E5%8C%97%E4%BA%AC%E5%8D%9A%E9%9B%85%E6%98%8E%E6%82%A6%E5%AD%A6%E6%A0%A1-%E6%A0%A1%E6%8B%9B%E4%BB%8B%E7%BB%8D.pptx.pdf
- 【Aurora Boya Academy of Beijing. (2020). *Introduction*. https://career.bnu.edu.cn/userfiles/db77e711225a4a83a14420a4fa8e2ee7/files/cms/article/attachment/2022/05/%E5%8C%97%E4%BA%AC%E5%8D%9A%E9%9B%85%E6%98%8E%E6%82%A6%E5%AD%A6%E6%A0%A1-%E6%A0%A1%E6%8B%9B%E4%BB%8B%E7%BB%8D.pptx.pdf】
- 石晶、郭堯、李思琪、尹澤軒（2019）。新時代國際教育資源本土化之路與成都華德福探索。國家治理，3，2-16。
- 【Shi, J., Guo, Y., Li, S.-Q., & Yin, Z.-X. (2019). The path of localiz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hengdu Waldorf School. *Governance*, 3, 2-16.】
- 林顯明（2023）。臺韓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治理經驗及政治菁英、行政官僚與公民社會互動關係之研究。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12，31-73。
- 【Lin, H.-M. (2023).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olitical elite, bureaucrat,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pandemic governance: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aiwan and South Korea. *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12, 31-73.】

林顯明、黃鈺淳（2024）。從「狼性」到「躺平」：中國大陸青年世代的生活處境與未來無力感。《**展望與探索**》，22(3)，51-69。

【Lin, H.-M., & Huang, Y.-C. (2024). From ‘wolfishness’ to ‘lying flat’: The life circumstances and pessimistic outlook on the future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in Mainland China. *PROSPECT & EXPLORATION*, 22(3), 51-69.】

俞可、陳雅璐（2018）。五大基點托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事業。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8n/2018_zt18/zt1818_pl/zjwz/201809/t20180920_349533.html

【Yu, K., & Chen, Y.-L. (2018). *The five key pillars supporting the educational endeavor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8n/2018_zt18/zt1818_pl/zjwz/201809/t20180920_349533.html】

挑戰者（2018）。T School | 一所幸福的不一樣的學校。https://mp.weixin.qq.com/s/H5qNO9M7qpxry4AFES6AkW

【Challenger. (2018). *T School | A happy and unique school*. https://mp.weixin.qq.com/s/H5qNO9M7qpxry4AFES6AkW】

柯小剛（2017）。不能放任野蠻讀經：引導經典教育健康發展。《**探索與爭鳴**》，2017(1)，64-70。

【Ko, X.-G. (2024). Cannot allow unregulated classics-reading: Gui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education.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17(1), 64-70.】

留學（2022）。成長需要「自然而然」：打造國內創新教育「桃花源」——專訪日日新學堂校長張冬青。https://liuxue.gmw.cn/2022-11/08/content_36145645.htm

【Studying Abroad. (2022). *Growth requires ‘natural development’: Creating a domestic ‘Utopia’ of innovative education—An interview with Zhang Dongqing, principal of Ririxin Academy*. https://liuxue.

- gmw.cn/2022-11/08/content_36145645.htm】
- 袁玉芝、劉復興（2022年4月12日）。**教育治理的關鍵在於制度現代化**。光明日報，15版。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2/0412/c40531-32396701.html?fbclid=IwAR3dwCUnZGCNubUIjDAGW7CupTQjwUgSjFmPwMH8-WEcSVLloh4OGKjs46o>
- 【Yuan, Y.-Z., & Liu, F.-X. (2022, April 12). *The key to educational governance li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institutions*. *Guang Ming Daily*, 15th ed.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22/0412/c40531-32396701.html?fbclid=IwAR3dwCUnZGCNubUIjDAGW7CupTQjwUgSjFmPwMH8-WEcSVLloh4OGKjs46o>】
- 基督教日報（2019年5月1日）。**宗教報告揭：中國2030年基督徒全球佔冠**。 <https://chinese.gospelherald.com/articles/27862/20190501/%E5%AE%97%E6%95%99%E5%A0%B1%E5%91%8A%E6%8F%AD-%E4%B8%AD%E5%9C%8B2030%E5%B9%B4%E5%9F%BA%E7%9D%A3%E5%BE%92%E5%85%A8%E7%90%83%E4%BD%94%E5%86%A0.htm>
- 【Christian Daily. (2019, May 1). *Religious report reveals: China has the world's largest Christian population by 2030*. <https://chinese.gospelherald.com/articles/27862/20190501/%E5%AE%97%E6%95%99%E5%A0%B1%E5%91%8A%E6%8F%AD-%E4%B8%AD%E5%9C%8B2030%E5%B9%B4%E5%9F%BA%E7%9D%A3%E5%BE%92%E5%85%A8%E7%90%83%E4%BD%94%E5%86%A0.htm>】
- 康曉光、韓恒（2005）。分類控制：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社會學研究**，6，73-89。
- 【Kang, X.-G., & Han, H. (2005). The system of differential controls: A study of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ological Research*, 6, 73-89.】
- 張瑞芳（2016）。我國在家上學合法化路徑選擇分析。**教育理論與實踐**，36，29-31。
- 【Zhang, R.-F. (2016). The legalization of home schooling in China.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36, 29-31.】

- 符芬菊（2020）。北京青年報：當績點為王「囚徒」該如何突圍。
<http://opinion.people.com.cn/BIG5/n1/2020/1026/c1003-31905355.html>
- 【Fu, F.-J. (2020). *Beijing Youth Daily: How should 'prisoners' break free when GPA rules all?* <http://opinion.people.com.cn/BIG5/n1/2020/1026/c1003-31905355.html>】
- 陳嫻郁（2014）。國家與國家職能之思辯：一個歷史社會學的觀點。全球政治評論，48，179-206。
- 【Chen, Y.-Y. (2014). State and state capacity: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48, 179-206.】
- 提雅學園（2021）。<https://www.behance.net/gallery/101263743/-THEIA-ACADEMY>
- 【Theia Academy. (2021). <https://www.behance.net/gallery/101263743/-THEIA-ACADEMY>】
- 馮朝霖（2001）。另類教育與全球思考。教育研究月刊，92，33-42。
- 【Fong, T.-L. (2001). Alternative education and global thinking.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92, 33-42.】
- 楊東平、袁芳艷（2013）。中國在家上學研究報告。21世紀教育研究院。
- 【Yang, D.-P., & Yuan, F.-Y. (2013). *Research report on homeschooling in China*. 21st Century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 楊春雪（2019年1月22日）。為什麼共產黨員必須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寧夏日報。<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9/0122/c40531-30584715.html>
- 【Yang, T.-X. (2019, January 22). *Why must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be atheists?* Ningxia Daily.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9/0122/c40531-30584715.html>】
- 鳳凰網（2019）。教育部：嚴查以「讀經班」等替代義務教育。<https://guoxue.ifeng.com/c/7lM578qilPM>
- 【IFENG.COM. (2019).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rict investigation of replac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with 'classics-reading classes' and*

- similar programs*. <https://guoxue.ifeng.com/c/71M578qilPM>】
- 邊家珍 (2013)。讀經謹防三個偏向:將經典的內容功利化、庸俗化。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3/0318/c85037-20823057.html>
- 【Bian, J.-Z. (2013). *Beware of three biases in classics-reading: Turning the content of classics into utilitarian and vulgar practices*.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3/0318/c85037-20823057.html>】
- Bass, R. V., & Good, J. W. (2004). Educare and educere: Is a balance possible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Education Forum*, 68(2), 161-168.
- Billioud, S., & Thoraval, J. (2015). *The sage and the people: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wen, G. A. (2009). Document analysis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9(2), 27-40. <https://doi.org/10.3316/QRJ0902027>
- Bridgeway Academy. (2022). *Homeschooling resources at your fingertips*. <https://homeschoolacademy.com/blog/homeschooling-in-china/>
- Chan, R. K. H., & Wang, Y. (2024). 'State advances, min retreats': Recentralization of minban education in China. In A. Santalova & K. Pöder (Eds.), *Privatization in and of public education* (Online ed., pp. 1-10). Oxford Academic.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7673508.003.0010>
- Chiang, Y.-L. (2022).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an Evangelical City Church. (2024). *China is trying to suppress Christianity through educational repression*. <https://www.citychurch.ee/china-is-trying-to-suppress-christianity-through-educational-repression/>
- Crabb, M. W. (2010). Governing the middle-class family in urban Chin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questions of choice. *Economy and Society*, 39(3), 385-402.
- Engelmann, S. (2022). Alternative(s): Better or just different? *Journal of*

-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56(4), 523-534. <https://doi.org/10.1111/1467-9752.12702>
- Evans, P. (2005). Harnessing the state: Rebalancing strategies for monitoring and motivation. In M. Lange & D. Rueschemeyer (Eds.), *States and development: Historical antecedents of stagnation and advance* (pp. 26-47). Palgrave Macmillan.
- Hannum, E., Park, A., & Cheng, K. M. (2007). Market reforms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China. In E. Hannum & A. Park (Eds.),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pp. 1-25). Routledge.
- Hobbes, T. (2018). *Leviathan, 1651*. Lerner Publishing.
- Huang, Z., Wang, T., & Li, X. (2015).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ducational changes in China.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4(1), 24-41. <https://doi.org/10.1177/1478210315612644>
- Kelly, D. M. (2014). Alternative learning contexts and the goals of democracy in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16(14), 383-410. <https://doi.org/10.1177/016146811411601403>
- Knežić, I. (2020).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sociability: Critical comparison of Th. Hobbes' and J. J. Rousseau's approach. *Journal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 11(1), 15-29.
- Koesel, K. J. (2013). The rise of a Chinese house church: The organizational weapon.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572-589.
- Lin, H. M. (2018). Book review: Guanxi, social capital and school choice in China: The rise of ritu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9(1), 135-139.
- Lizhu, F., & Na, C. (2015). The religiousness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 religion in China today. *Cultural Diversity in China*, 1(1), 27-43. <https://doi.org/10.1515/cdc-2015-0005>
- Mills, M., & McGregor, G. (2017). Alternative educatio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https://oxfordre.com/education/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64093.001.0001/acrefore-9780190264093-e-40>

- Naftali, O. (2010). Recovering childhood: Play, pedagogy, and the rise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Modern China*, 36(6), 589-616.
- Nagata, Y. (2016). Fostering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society: The caring communities of 'children's dream park' and 'free space en' in Japan. In H. E. Lees & N. Noddings (Eds.), *The Palgrav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pp. 241-256). Palgrave Macmillan.
- Negoita, M. (2018). The always embedded state: Six types of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 8, 172-184.
- Papadopoulos, Y. (2003). Cooperative forms of governance: Problem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2(4), 473-501.
- Saich, T. (2016).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st-1949. *Brill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in China*, 1(1), 1-57. <https://doi.org/10.1163/24519227-12340001>
- Schulte, B. (2018). Allies and competitors: Private schools and the state in China. In G. Steiner-Khamsi & A. Draxler (Eds.), *The state, business and educati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revisited* (pp. 68-84).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Sheng, X. (2018a). Home education and law in China. *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 50(6), 575-592. <https://doi.org/10.1177/0013124517713606>
- Sheng, X. M. (2018b). Confucian home education in China. *Educational Review*, 71(6), 712-729.
- Sheng, X. M. (2018c). Christian homeschooling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Religious Education*, 41(2), 218-231.
- Sun, Y. F. (2020).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Steiner Fever' in China: Why are Chinese parents turning away from mainstream education towards the holistic 'Way' of Steiner education?*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Wang, C. (2022). Resurgence of Confucian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rental involvement, moral anxiety, and the pedagogy of

- memorisation.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52(3), 1-18.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2022.2066639>
- Wang, C., & Billioud, S. (2022). Reinventing Confucian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ethnographic explorations. *China Perspectives*, 2022(2), 3-6.
- Wang, Y., & Chan, R. K. (2015). Autonomy and control: The struggle of Minban school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45, 89-97.
- Xu, W., & Spruyt, B. (2022). 'The road less travelled': Towards a typology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58(4), 434-450. <https://doi.org/10.1080/03050068.2022.2108615>
- Zhang, C. (2021). State capacity and state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Review*, 21(3), 1-20.

How an Authoritarian State Responds to Alternative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s, Governances, and Challenges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Hsien-Ming Lin*

Abstract

Research Purpose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alternative education, which challenges the state-led formal education system, develops in an authoritarian country, where it is not fully accepted by the government. Using mainland China as a case study, the researcher adopts the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of state and societal relations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response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altern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Design/Method/Approach

This study adopted the documentary analysis method. The researcher utilized multiple Chinese and English databases and search platforms, using keywords, such as “mainland China” and “alternative education,” to collect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literature, government policy reports, and media discussions for the analysis. Regarding the qualitative documentary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followed a four-step process: reading, describing, categoriz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collected data. This process was repeated multiple times to addres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o compile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search Findings or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dopts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toward various types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most tolerant toward “homeschooling” and “Waldorf school,” exhibiting a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 that resembles “inclusive embeddedness.” In contrast, the government adopts the harshest stance toward religiously affiliated “church schools” and “Classics Reading school,” resulting in a more tense “repressive embeddedness” in their interac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ve school”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lls in the middle, with a relatively harmonious interaction that also resembles “inclusive embeddedness.”

Research Originality/Value

This study is one of the few to emplo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governance types used b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From an original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help fill the gap in current research on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Furthermore, from a research value standpoint, this study is among the few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Education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readers with an interes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East Asian regions but also in

mainland China. However, it also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because it can be used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as a basis for discussing and formulating alternative education policies for governments.

Keywords: Mainland China, alternative education, authoritarian state, state and society relations, education governance



DOI : 10.6869/THJER.202406_41(1).0003

Received: May 14, 2024; Modified: August 6, 2024; Accepted: August 14, 2024

* Hsien-Ming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of Teacher Educ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E-mail: hsienming79@mail.nptu.edu.tw